



怀念文学导师鲁迅

0.96

武汉市文联文学部

大。他的全部著作，是一个巨大的精神宝库。他的光辉思想，是多方面的，不仅从中可以找到过去取得胜利的原因，同时也可以找到指引我们更勇敢前进的道路和方向。

接过鲁迅的战斗火把，继承和发扬他的战斗精神，使我们的文学事业更好地为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服务，我们认为是不容辞的责任。

从这一动机出发，我们编印了这个小小的纪念集。里面有评论、散文、诗歌，形式不同，目的则是一致的，它既是我们对伟大革命先驱者鲁迅献出的“一瓣心香”，同时也是接过战斗火炬继续前进的誓言。

由于时间匆忙，力量有限，这个小册子水平不高，也可能有不少疏漏和错误。孤立来看，它的声音是微弱的，但我们也不为此自馁。如果它能和全国纪念鲁迅的洪流汇合在一起，在推动学习鲁迅的热潮中起到一波一浪的作用，我们也就心满意足了。

武汉市文联文学部

一九八一年八月十五日

前 言

今年九月，是鲁迅诞生一百周年。全国人民，全国的革命文艺工作者，都在热烈而又隆重地展开纪念活动。世界各地的革命和进步作家，也有很多飘洋过海，赶来参加这一盛大的纪念活动。

鲁迅是一九三六年十月逝世的，他在《死》那篇散文中，谆谆嘱咐后人：“忘掉我，管自己生活”，“不要做任何关于纪念的事情”。但人们却没法子忘记他，相反的，时间越久，人们对他的怀念反而越加深切，感到他并没有死，仍然活在我们中间，仍然领导着我们前进。

鲁迅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战斗的一生，他的全部心血，都献给了中国革命事业和新文化事业。毛泽东同志对他的一生，作了符合客观实际的极高的评价，指出他的骨头是最硬的，他没有丝毫的奴颜与媚骨，他的性格是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最宝贵的性格。他是代表全民族大多数向敌人冲锋陷阵的最英勇的旗手，他的方向，“就是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

在他的犀利的笔锋下，形形色色的敌人，望风披靡，溃不成军；在他的耐心培养下，新生的革命力量，一批批的成长壮

目 录

前 言武汉市文联文学部

· 评 论 ·

作家的脚应该永远站在一只船上

.....李 蕤 (1)

“神化论”的辨正易竹贤 (10)

鲁迅与新诗史上的第二次论争

——《热风》注释札记之一.....陆耀东 (16)

研究和学习鲁迅的意识流手法

.....杨江柱 (23)

鲁迅小说的现实主义精神

.....古远清 (33)

我们需要鲁迅式的文艺批评家

.....洪 源 (40)

鲁迅论诗江 柳 (47)

鲁迅式的幽默陈泽群 (55)

“根本问题是在作者可是一个‘革命人’”

——略谈鲁迅关于题材问题的论述

.....刘崇顺 (65)

谈“费厄泼赖”如今仍应缓行

——重读《论“费厄泼赖”应该缓行》

.....吴天启 (72)

学习鲁迅的艺术独创精神	李华章 (78)
鲁迅与俄苏文学	杨小岩 (82)

· 散 文 ·

“鲁迅精神”赞	碧 野 (88)
希望与绝望	
——并附记	曾 卓 (91)
朝 “山”	吉学沛 (95)
伟大的诞辰	涂怀章 (98)
在伟人降生的地方	
——访鲁迅故居	江 晖 (104)
回忆在“鲁艺”学习的日子里	
.....	楚 奇 (110)

· 诗 歌 ·

长夜的火光	莎 蕤 (119)
写在《野草》的扉页上	叶圣华 (123)
鲁迅的笔	管用和 (126)
投枪赞	徐广信 (128)
我要会写的话	姚振起 (130)
我怎么回答	彭介凡 (132)
凤凰台上忆吹箫	李德裕 (135)

作家的脚应该永远站在 一只船上

李 蕤

今年是鲁迅诞生一百周年，全国的革命人民，全世界的进步人类，都在隆重纪念他。中国的每一个文艺团体，每一个革命的文艺工作者，也都以不同的形式，纪念这位新文化的奠基者。

鲁迅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战斗的一生。在他的短短五十六岁的生命中，为中国的劳苦大众的彻底解放，为革命文学事业的发展成长，付出了全部的生命和心血。从辛亥革命到北伐战争，从十年内战到全民族联合抗日前夕，他经历了无数的历史曲折，惊涛骇浪。每一个战斗历程，都有他的战斗足迹，他留给我们的光辉著作——《鲁迅全集》，更是一个巨大的精神财富。

毛主席在《新民主主义论》中，对鲁迅的战斗一生，作了高度评价。他指出：“鲁迅是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他不但是伟大的文学家，而且是伟大的思想家和伟大的革命家。鲁迅的骨头是最硬的，他没有丝毫的奴颜和媚骨，这是殖民地半殖民

地人民最可宝贵的性格。鲁迅是在文化战线上，代表全民族的大多数，向着敌人冲锋陷阵的最正确、最勇敢、最坚决、最忠实、最热忱的空前的民族英雄。鲁迅的方向，就是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并提出号召：“一切共产党员，一切革命家，一切革命的文艺工作者，都应该学鲁迅的榜样，做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的‘牛’，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对照鲁迅战斗的一生，就知道毛主席对他的评价毫无夸大，而是恰如其分，“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就是他的战斗纲领。为了唤醒被压在三座大山下面的劳动人民，他以无限的同情，写了阿Q、祥林嫂、七斤、爱姑、闰土……这些不幸的小人物的命运，既哀其不幸，又怒其不争；而对于骑在他们头上的封建阶级的代表赵太爷、假洋鬼子、四叔等，则无情地加以揭露和鞭打；为了唤醒进步的青年冲出封建思想的束缚，替他们开辟出一条生路，他和形形色色的复古派作不妥协的斗争。他指出几千年的封建社会，是一台人吃人的筵席，几千年被奉为“金科玉律”的孔孟之道，实质上是让这吃人的筵席一直安排下去的吃人之道。他号召青年：要“敢说，敢笑，敢哭，敢怒，敢骂，敢打，在这可诅咒的地方击退了可诅咒的时代！”号召他们：“扫荡这些食人者，掀掉这筵席，毁坏这厨房，则是现在的青年的使命！”为了树立革命青年革命的信心，鼓励青年前进的勇气，他指出：“什么是路？就是从没路的地方践踏出来的，从只有荆棘的地方开辟出来的。”正是由于鲁迅出身于旧营垒，熟悉他们的情况，又毫不可惜他们的溃灭，所以反戈一出，就足以制敌于死命。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鲁迅就是走在反帝反封建运动前面的一员勇敢的闯将。

“五四”新文化运动后期，由于十月革命一声炮响送来了马列主义，由于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广大人民有了新的觉醒，

反帝反封建运动更加蓬蓬勃勃地开展，使一切剥削阶级胆战心寒，认为末日已到，于是互相勾结，加紧对革命力量的压迫和摧残。这时，斗争便更趋尖锐和复杂，原来曾经是新文化盟员的胡适背叛了革命，向封建阶级卖身投靠，成为新的复古派。他以“博士”的头衔，“学者”的面孔，劝青年“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在“青年必读书”栏目中开了从经学到佛学书籍一百多种，企图把青年诱骗到“故纸堆中”，脱离反帝反封建的斗争，鲁迅立即予以反击，无情的撕破他的画皮，指出他是“脖子上挂着一个小铃铎”、走在群羊前面的“山羊”，让青年们温驯地跟着他走进“屠场”。接着还写了许多杂文，揭露这位“文化班头博士衔”的人物，实际是“羊样的凶兽”。这些揭露，使“新国故”派露出他们的原形，受到广大人民的唾弃，并越过他们设置的陷阱。

一九二七年蒋介石背叛革命，展开血腥的大屠杀。从此后，中国革命便进入更黑暗的漫漫长夜，两种反革命的“围剿”同时开始，一种是“军事围剿”，以倾国之力，连续围攻革命红军根据地；另一方面是“文化围剿”，除对进步作家监视迫害、对进步报刊检查封锁之外，封建阶级的遗老遗少，资产阶级的反动论客，蜂拥而出，向新生的无产阶级文艺进行“围攻”。梁实秋便是最突出的代表。他公开说：“资产是文明的基础”，“所以攻击资产制度，就是反抗文明。”他认为：“一个无产者假如他是有出息的，只消辛辛苦苦诚诚实实工作一生，多少必定可以得到相当的资产。这才是正当的生活斗争的手段。”从这个反动立场出发，他写了一篇题为《文学是有阶级性的吗？》一文，指责无产者理论的错误是“在把阶级的束缚加在文学上面”。他认为文学是没有阶级性的，因为资本家和一个劳动者，虽然各有不同，但也有很多地方相同，

“他们的人性并没有两样”，例如都有喜怒哀乐，都有恋爱，“文学就是表现这最基本的人性的艺术”。鲁迅一针见血地指出：“文学不借人，也无以表示‘性’，一用人，而且还在阶级社会里，即断不能免掉所属的阶级性，无须加以‘束缚’，实乃出于必然。自然，‘喜怒哀乐，人之情也’，然而，穷人决无开交易所折本的懊恼，煤油大王那会知道北京捡煤渣老婆子身受的酸辛；饥区的灾民，大约总不去种兰花，像阔人的老太爷一样，贾府的焦大，也不爱林妹妹的。”鲁迅通过最平易的事物，幽默讽刺的语言，道出了“存在决定意识”的真理，戳破了“超阶级”和“人性”的谎言。

接着，鲁迅进一步指出：“在阶级社会中，文学家虽自以为‘自由’，自以为超了阶级，而无意识底地，也终受本阶级的阶级意识所支配，那些创作，并非别阶级的文化罢了。例如梁先生的这篇文章，原意是在取消文学上的阶级性，张扬真理的。但以资产为文明的祖宗，指穷人为劣败的渣滓，只要一瞥，就知道是资产家的斗争的‘武器’——不，‘文章’了。”一下子便撕下梁实秋的“超阶级”的外衣，露出了他的资产阶级“乏走狗”的原形。

在抗日战争爆发的前一年，也就是鲁迅逝世的那一年中，民族危机空前严重，斗争也更加复杂尖锐。一方面，中国共产党已经完成了二万五千里的长征，到达陕北根据地，向全国人民提出抗日救国的十大纲领；另一方面，国民党继续执行“先安内后攘外”的反动卖国政策；一方面文艺战线上出现了高喊铁和血的为民族送丧的“民族文学”，另一方面，中国托洛茨基派又打着最最革命的旗号，反对中共的联合抗日主张，诬蔑联合抗日是“斯大林官僚主义者要再一次把中国革命断送交刽子手们，使再遭一次屠杀”。这中间，鲁迅虽在病中，却像狮子

一样战斗着。他在《文章与题目》一文中，揭露“安内攘外”的题目已经做绝，只剩下“外不必攘”和“外就是内”了；在《中国人的生命圈》一文中，他用生动形象的比喻把中国画成两个圈子，大圈子里套着小圈子，日本侵略者不断从外向大圈子炸进来，国民党又不断向小圈子里面炸进去，揭露了国民党实际是在推行替帝国主义做清道夫的任务。在《答托洛斯基派的信》中，尖刻地指出：“你们的‘理论’，确比毛泽东们高超得多，岂但得多，简直一是在天上，一是在地下。但高超固然是可敬佩的，无奈这高超又恰恰为日本侵略者所欢迎，则这高超仍不免要从天上掉下来，掉到地上最不干净的地方去。”

“你们的高超的理论，将不受中国大众所欢迎，你们的所为有背于中国人现在为人的道德。”给托派一记响亮的耳光。在这封信里，同时庄严地声明：“那切切实实，足踏在地上，为着现在的中国人的生存而流血奋斗者，我得引为同志，是自以为光荣的。”鲜明地表示站在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同志一边，把全部希望寄托到他们身上。

从十年的“围剿”与“反围剿”到联合各阶级共同抗日，民族的矛盾上升到第一位的矛盾，阶级斗争降到第二位的矛盾，这是时代的一个大转变和急转弯，在革命内部，出现各种分歧的思想，是不足为怪的。而鲁迅，则高瞻远瞩，看到这个联合抗日的民族统一战线，实质上是无产阶级战斗任务的扩大和加重，和国民党是既有联合又有斗争，无产阶级不能放弃自己的领导权。文艺也是如此，左翼作家联盟的取消，并不意味着领导权的放弃，“决非停止了历来的反对法西斯主义，反对一切反动者的血的斗争，而是将这斗争更深入，更扩大，更实际，更细微曲折，将斗争具体化到抗日反汉奸的斗争，将一切斗争汇合到抗日反汉奸斗争这总流里去。决非革命文学要放弃他的

阶级的领导责任，而是将它的责任更加重，更放大，重到和大到要使全民族，不分阶级和党派，一致去对外。这个民族的立场，才真是阶级的立场。托洛斯基的中国徒孙们，似乎糊涂到连这一点都不懂的。但有些我的战友，竟也有在作相反的‘美梦’者，我想，也是极糊涂的昏虫。”（《论现在我们的文学运动》）既看到联合，又看到斗争，既看到当前现实的任务又看到将来的发展，既看到要扩大统一战线，连鸳鸯蝴蝶派也要团结，又不忘无产阶级为人民大众服务的主要方向，这里面闪耀着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论的光辉，和毛主席当时的战略思想完全是一致的。毛主席在评价鲁迅战斗的一生时，除了称赞他是“最勇敢、最坚决、最忠实、最热忱”的空前的民族英雄之外，还首先加上“最正确”的评论，指出“鲁迅的方向就是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决不是偶然的。

从以上极其概略的叙述中，主要想说明一点，就是鲁迅战斗一生，从始至终，是和人民大众，无产阶级及其先锋队——中国共产党站在一起的，风雨同舟的、生死相共的。他考虑一切问题，都是从有利于群众、有利于革命为出发点和落脚点的，文艺在他的手里，只是为达到这一崇高的目的的战斗武器。他从来没有把文学事业看成个人的事业，没有考虑过个人的荣辱得失，甚至生命的安危，没有考虑过使自己的作品“永远不朽”，也从没有把“文艺自由”、“文艺尊严”凌驾于革命利益之上。他当初所以弃医从事文学，主要是在一次电影中看到日本人把一个中国人以俄国间谍罪名砍头示众，四围观看的中国人都麻木地看着，毫无所动，从而感到：“凡是愚弱的国民，即使体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壮，也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病死多少是不必以为不幸的。所以我们的第一要著，是在改变他们的精神，而善于改变精神的是，我那时以为当然要推文

艺，于是想提倡文艺运动了。”（《呐喊·自序》）十分明确，改造国民精神是目的，文艺运动是手段，后者是服从前者的。在《我怎么做起小说来》一文中，进一步对这一点作了阐述，他说：“这里还应该补叙一点的，是当我留心文学的时候，情形和现在很不同：在中国，小说不算文学，做小说的也不能称为文学家，所以并没有人想在这一条道路上出世。我也并没有要将小说抬进‘文苑’里的意思，不过想利用它的力量，来改良社会。”

因此，随着斗争形势的发展，当他感到利用小说这一武器还不够的时候，他就拿起投枪匕首——杂文作为战斗的武器。大家都知道，鲁迅的杂文，在五四前后的反封建反复古的斗争中，在和胡适之流的实验主义斗争中，在和梁实秋的资产阶级的虚伪的“人性论”斗争中，在和“第三种人”的“超阶级”“文艺自由”的斗争中，……其威力之猛，震幅之广，影响面之大之深，都是空前未有的。鲁迅晚年的创作，主要是这些战斗性的杂文，粉碎国民党反动派的“文化围剿”，主要也得力于这一武器。到今天，甚至连敌人也不得不承认鲁迅的杂文是文学艺术中的瑰宝。然而，在鲁迅的杂文一出现的时候，便受到轻蔑和嘲笑，明明暗暗的攻击。正人君子不承认它是文学作品，天真糊涂的人也劝他不要为此浪费时间，劝他做托尔斯泰，从事长篇创作。鲁迅对这些，一概置之不理。他在《华盖集·题记》中说：“也有人劝我不要做这样的短评。那好意，我是很感激的，而且也并非不知道创作之可贵。然而要做这样的东西的时候，恐怕也还要做这样的东西，我以为如果艺术之宫里有这么麻烦的禁令，倒不如不进去；还是站在沙漠上，看看飞沙走石，乐则大笑，悲则大叫；愤则大骂，即使被沙砾打得遍身粗糙，头破血流，而时时抚摩自己的凝血，觉得若有

花纹，也未必不及跟着中国的文士们去陪莎士比亚吃黄油面包之有趣。”这就是说，他宁可不进“艺术之宫”，也决不开革命斗争的任务，放下杂文武器。

每逢革命遇到紧急关头，在“革命文学者”内部，总要发生急速的分化。有些自称“突变”过来的革命文学家，一下子又很快的“突变”回去。鲁迅指出：这固然由于环境的改变，但有些“革命文学者”的本身里，还藏着容易犯病的病根。

他尖锐地指出：“‘革命’和‘文学’，若断若续，好像两只靠近的船，一只是‘革命’，一只是‘文学’，而作者的每一只脚就站在每一只船上。当环境较好的时候，作者就在革命这一只船上踏得重一点，分明是革命者，待到革命一被压迫，则在文学的船上踏得重一点，他变了不过是文学家了。”这一生动而形象的比喻，明白而透彻的分析，深刻而又犀利地揭示出了某些作者灵魂深处的东西，也概括地叙述了历次革命中，总有一批人分化出来，有的高升，有的退隐，有的落荒，有的背叛的根本原因。

为了告诫革命文学青年摆正文学和革命的正确关系，鲁迅不惮烦厌地反复阐述这一真理。在《伪自由书·后记》一文中，他又说：“革命文学者若不想以他的文学，助革命更加深化，展开，却借革命来推销他自己的‘文学’，则革命高扬的时候，他正是狮子身中的害虫，而革命一受难，就一定要发现以前的‘良心’，或以‘孝子’之名，或以‘人道’之名，或以‘比正在受难的革命更加革命’之名，走出阵线以外，好则沉默，坏就成为叭儿的。这不是我的‘毒瓦斯’，这是彼此看见的事实！”

今天，鲁迅离开我们已四十五年。中国革命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中国人民和领导他们革命的政党，已经再也不是“孺子”而是成人了。今天的革命文学工作者，较之鲁迅生

活工作的黑暗年代，不知幸福多少倍。但是，从实现共产主义的远大理想来说，走过的一段路，也不过是历史短暂的一瞬。革命的道路正长，每一段前进的路，都还有重重的阻力和困难，大规模的阶级斗争虽然不存在，但腐朽阶级尸体所散发的思想毒菌，并不曾就此消灭。“战斗正未有穷期，老谱将不断袭用”，革命文学，必须像鲁迅所教导的那样，和人民、和革命同命运、共呼吸，一道战斗，一道成长和发展。任何企图游离开革命，把文学变成个人事业的企图，都是错误的，也是注定没有出路的。

前不久在全国部分文学作品获奖作者茶话会上，邓颖超同志热情称赞大家都是“专家”之后，又语重心长地说，希望大家在这些“家”的前面，还要加上一个“革命家”。寥寥数语，值得认真咀嚼深思。因为，这几句话里就闪烁着鲁迅的“俯首甘为孺子牛”的精神，而做到这一点，并非可以一蹴而就的。一切文学工作者能够做到这一点，就是对伟大文学先驱鲁迅最好的纪念。

一九八一年八月二日于麻城龟山

“神化论”的辨正

易 竹 贤

大凡历史上的伟大人物逝世之后，或毁或誉，或褒或贬，往往有一番是非争论。通过这种争论，如果是真正的伟人，那么，他的业绩会更显得辉煌，思想会更显出深刻性和真理的光芒，人格会更显得博大而崇高；人们对他的认识便也会更进一步。鲁迅逝世后四十多年的情况便正是这样。而在对于鲁迅的是非褒贬中，有一种时起时伏却贯穿始终的论调，即所谓“神化论”，近些年来不少人又引为时髦言论。因此需要有所辨正。

我们信奉历史唯物主义，当然反对任何偶像，反对把任何人神化，也绝不赞成神化鲁迅。鲁迅自己生前总是严于解剖自己，从不文过饰非，当然更不愿意别人把他说成先知，把他神化。

但是，“神化论”却很早就被提出来了。鲁迅逝世的当年冬天，苏雪林写的《与蔡子民先生论鲁迅书》，大约是最早提出“神化论”的。他指责“左派利用鲁迅为偶像，恣意宣传，将为党国之大患也”。其中充满漫骂的恶腔调，并公开为国民党蒋政权辩护，毁谤革命左派和共产党，活现出一副走狗

的嘴脸。

一九三七年，陈独秀发表文章，指责共产党把鲁迅当成神。他说：

在民国十六七年，他（按：指鲁迅）还没有接近政党以前，党中一班无知妄人，把他骂得一文不值，那时我曾为他大抱不平。后来他接近了政党，同是那一班无知妄人，忽然把他抬到三十三层天以上，仿佛鲁迅先生从前是个狗，后来是个神。我却以为真实的鲁迅并不是神，也不是狗，而是个人，有文学天才的人。②

孤立地看，这段话并没有什么毛病，但如果联系陈独秀当时的立场来考察，便会看出“麒麟皮下”的“马脚”。陈独秀在“五四”时期曾经是鲁迅创作活动的积极支持者，曾多次催促鲁迅写小说。但他堕落成为托派以后，读到鲁迅的《答托洛斯基派的信》，便深为怨恨，尤其不满于鲁迅对于中国共产党人和毛泽东同志的战斗情谊。上述文章中指责的所谓“党中一班无知妄人”，实际上矛头是指向执行马列主义路线的中国共产党人；而貌似公允的指责把鲁迅当神，其实毫无实际根据，是企图反对我党对鲁迅的正确评价，用含含糊糊的指责来贬损鲁迅的。自然，这无损于鲁迅的光辉。

到了四十年代，随着中国人民对鲁迅认识的深化，毛泽东同志在《新民主主义论》、《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等论著中，对鲁迅作了科学的崇高的评价。于是，又有人出来指责，说是“神化”鲁迅了：

有的人把鲁迅“神化”了，誉之为“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文化新军的最伟大最英勇的旗手”，甚至说：“鲁迅的方向，就是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至于“鲁迅大师”，“青年导师”……等肉麻称谓，更不必说，盖起洋楼开办什么“鲁迅艺术学院”，也已历有年所，这种政治性的捧死人，谁都明白是什么一回事，不懂得内幕的人觉得鲁迅交了死运，懂得这套把戏的觉得太肉

麻，如果站在一个严正的批评家的立场，那就感觉到这只是侮辱了死者，歪曲了真理！③

这种论调，在当年重庆国民党的一些报刊上还出现过一些。因为鲁迅是一位伟大的共产主义战士，忠诚地站在中国共产党一边，国民党蒋政权及其豢养的文人要攻击鲁迅，反对党和毛泽东对鲁迅的正确评价，是势所必然的了。

总观解放前的那些“神化论”者，论点虽然不尽相同，其基本内容却大体一致，大都是以反对“神化”为幌子，攻击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同志对鲁迅的科学评价，把这种评价诬蔑为“神化”。他们贬损、攻击鲁迅，矛头主要是向着中国共产党的，反动的立场、观点异常鲜明。

近几年来重新泛起的“神化论”，虽然也是打着反对“神化”鲁迅的旗子，而立场观点与以往的“神化论”者却有根本区别。他们大多是一向赞成我党和毛泽东同志对鲁迅的评价的；只是近年来乘揭批“四人帮”的革命浪潮，出而指责与他们持不同学术观点的鲁迅研究者“把鲁迅神化”了，说鲁迅研究也有“两个凡是”的问题。这种“神化论”，在政治上自然无可厚非，而在学术上却同样是并无实际根据，站不住脚的。他们标榜实事求是，反对唯心史观和形而上学，但他们的文章却并没有列举出历史的或现今的任何一件确凿的材料和实例，来证明是谁、在什么时候、在什么文章中“神化”了鲁迅，而大都只是些含含糊糊的“莫须有”的罪名。因而这种论调也在起着明明暗暗地贬损鲁迅、妨害鲁迅研究的不良作用。

例子之一，是说有人认为《湘灵歌》是为纪念杨开慧而写的。这就是“神化鲁迅”。有位作者，根据左联刊物《文艺新闻》登载《湘灵歌》等三首诗时编者所加的总标题《鲁迅氏的悲愤》，副标题“以旧诗寄怀”，按语中有“闻此系作于长沙